

# 聂荣臻将军在抗战中的部分经历

廖 敏

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主力部队，而八路军开辟的战场，在一定意义上也被认为是中国军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当年八路军军歌中有几句歌词，如“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等，简略地提到了八路军的一些抗战史实。而正是在这些史实中，包含着我们江津人民的骄傲——聂荣臻将军——所作的一分贡献。值此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谨据《聂荣臻回忆录》的有关章节，就将军在抗战中的部份经历作一简单的介绍。

## （一）慷慨悲歌上战场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115、120、129三个师，聂荣臻将军被任命为115师师政委（师长是林彪）。为了确定八路军出师后的作战方针，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聂荣臻作为军队主要负责同志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他没有盲目附和林彪提出的以大兵团作战为主的意见，而是对毛主席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投了赞成票，并对此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补充。会后，部队举行了庄严的抗日誓师大会，分两路渡过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展开对日作战。

当时整个华北战场是一片失败景象。日军在轻取平津之后

气焰非常嚣张，调集三十万重兵沿交通要道长驱南下，妄图在三个月内就灭亡中国。而国民党军队则锐气尽失，将无斗志，兵无战心，还没见到鬼子就望风而逃，把必然失败的情绪向整个中国大地迅速地散播开来。在这样的形势下，可以说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已历史性地落在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肩上。我军的开赴前线，在国民党南逃大军的人潮中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一股逆流。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里的子弹还多，这时候上前线完全是去送死！而对我军指战员来说，即将与从未直接交过手的强大敌人展开血战，也都有着决死的精神准备！兵过太原时，车站上挤满了前来送行的山西人民，特别是许多东北流亡学生直到深夜仍不肯离去，整个场面充满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

## （二）首战平型关

9月23日，115师抵达位于晋东北战略要地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师领导觉得这里的地形不错，准备就在这里打响对日交锋的第一仗。当时侵华日军正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其主力部队分兵两路左右夹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大同之敌会师雁门关。他们的目的在于打开晋北通路，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军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在平型关打一个胜仗，不但可以阻滞日军的战略计划，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打破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聂荣臻将军不但从地形的角度肯定了打胜仗的可能性，更从打胜仗的政治意义方面强调了打好这一仗的必要性。随后，他又在战前动员会议上向全师干部讲解了我们的取胜条件和作战注意事项，动员全师指战员齐心协力打好出师以来的第一仗。

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之间，有一条长约十多华里的险要沟段，其地形非常适合于对途经沟底的鬼子军队进行居高临下的伏击。24日，115师主力部队按计划在这段沟道的南北两岸山地布署就绪，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占领镇北高地，以切断敌人的后路。25日凌晨七时，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共四千多人进入我伏击圈，一声令下，我全军指战员立即与不可一世的敌人展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浴血奋战。关于这次战斗，此前已有不少专文，无须本文重述。这次战斗的结果，因阎锡山部队的团城口阵地被鬼子突破，致使被围之敌大部突围逃窜而未能全部歼灭。尽管如此，这一仗仍然是八路军乃至整个中国抗战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 （三）创建根据地

平型关战斗结束之后，八路军还进行了如侧击南下忻口和太原的日军等作战行动，但根据党中央的决定，115师很快分出一部分人马，由聂荣臻将军率领投入了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当时聂荣臻将军手下全部人马仅三千人左右，要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和这样广大的一个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是非常单薄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思想和党的政策就更显得非凡的重要。聂荣臻将军作为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兼政委，一方面反复向同志们宣讲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艰巨性，鼓励大家建立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则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按毛主席战略方针办事，打开了一场人民战争。

以聂荣臻将军为主要负责人的晋察冀军区，抗战中所作的

努力和贡献需要大部头的专著去记叙和论述。笔者在本文中只能将其高度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借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三大“法宝”当年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丰富。在党的建设方面，根据地不但从上到下各级都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建立了以党为领导核心的各级边区政府，还创造性地开办抗日军政大学，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在统一战线方面，根据地为妥善解决好各民族各阶层的团结问题，胜利召开了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为协调处理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战成立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支持五台山和尚的抗日爱国行动，根据聂荣臻将军的原话引伸出的“我们出了家，但没有出国”的动员口号，在全国僧侣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武装斗争方面，根据地由内向外地开展了肃清反动势力，改造杂色武装，壮大人民军队，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等多项努力。其中，聂荣臻将军首创的边区部队是“子弟兵”的提法，较好地体现了党的军队的性质和任务，后来发展成为对整个人民军队的亲切称呼。

晋察冀军区成立于1937年11月7日，当时全部指战员仅三千人左右。短短数月之后，冀西根据地即拥有了数十个县的版图，并于1938年1月15日成立了边区政府。到1938年底，冀中也建立起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自平津路，南达沧石路的整个冀中平原的广大农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1940年，随着冀西、冀中、冀东和平西、平北根据地的相继建立，晋察冀边区已建设成为拥有数十万武装力量和五百六十万人口的巩固的根据地。它不仅成为敌人咽喉地带的心腹之患，而且为日后收复热河和解放东北准备了突出的前进基地。对于以聂荣臻将军为首的边区军民的努力，党中央一直有着高度的评价，毛泽东主席还亲自把聂荣臻撰写的报告定

名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代表党中央作了最充分的肯定。

#### (四) 发展游击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掌握了山地游击战的规律；但对于在冀中地区这样的大平原上打游击战，边区抗日军民面临的还是一个新课题。聂荣臻将军坚定地认为，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可以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的根据地照样可以牢牢地站住脚根。他多次组织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文章，使各级指挥员对我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有了深刻的了解。在党的洛川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指引下，通过一次又一次反扫荡斗争的具体实践，边区军民不但摸清了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基本规律，还先后创造出了诸如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特殊的作战方式。它们不但丰富和发展了我军的战术手段，后来还成为世界军事史上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成功范例。

边区军民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歼敌致胜的战例可以说不胜枚举。为了帮助大家当年这里发生的战事有个大体的了解，本文仅就其中有较大影响者略举数例：1937年11月，日军调集两万多人兵力对冀西发动了八面围攻，妄图将刚刚成立才半个月的晋察冀军区扼杀在摇篮中。边区军民在聂荣臻将军的直接指挥下，依靠才组建起来的游击武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死打伤一千多名日伪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扫荡。1938年7月上旬，冀东人民在边区部队

的推动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这次起义的参加人数突破了二十万，其声势之大不但震动全国，在全世界都发生了相应的影响。1938年9月，日军经周密准备，调集五万多人的兵力，对边区机关驻地发动了多路围攻。结果，我军经前后48天计一百多次战斗，毙、伤旅团长以下日军五千二百余名，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

这段时期，边区军民还打了一个影响足以与平型关大捷媲美的胜仗，那就是黄土岭围攻战。1939年11月，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中将亲率其兼任旅团长的第二混成旅团，孤军深入我腹地地带进行扫荡。在聂荣臻将军的直接指挥下，边区部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是在雁宿崖打了一场伏击战，一举歼灭日辻村大佐率领的六百余名日伪军。随后又巧妙地将前来报复的阿部规秀诱入黄土岭一带绝地，调集重兵四面围攻。激战中，日军被歼灭九百多名，敌酋阿部规秀也中迫击炮弹身亡。阿部规秀是日军的山地战专家，第二混成旅团在日军中也号称劲旅，这次失利，自然大大地损坏了“皇军的体面”。而且，阿部规秀还是自“皇军”成立以来死在战场上的第一名中将级军官，这次败仗对日军士气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后，日本国内最大报刊《朝日新闻》曾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为通栏标题，连续三天对他进行了哀悼。

### （五）百团大战

1940年8月，我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为打破敌人的分割包围，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展开了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聂荣臻将军所属部队负责破袭正太路的石家庄至平定段，另外对军区所辖范围内的其它铁路和公

路进行广泛的破击，以阻止敌人向正太路的增援。8月20日，八路军在正太路全线准时发起了攻击，顿时整个正太路沿线和同蒲路的部份地段都淹没在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次战役，八路军动用了两大军区全部机动力量，其规模之大确属前所未有，后来在宣传上就被发展成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战役的第一阶段，晋察冀军区部队不但参加了破路行动，还取得了攻占战略要地娘子关和歼灭井陘煤矿守敌等突出战果。其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攻占娘子关。那里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加上先后有国民党和日军连续多年构筑工事，确实算得上硬钉子。我军战士冒着敌人的浓密火网奋力仰攻，经三小时的反复冲击，终于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娘子关头，创造了我军攻坚战史上的光辉战例。第二阶段，在涞源城攻坚战中，部队以顽强对顽强，用白刃战彻底消灭了驻守东团堡的敌井田部队。日军的这支部队全部由士官生组成，十分凶狠顽强，他们在激战中曾不顾一切地连续施放毒气，其残部最后竟纵火集体自尽。后来日军为此作有《大日本皇军驻东团堡井田部队长恨歌》，刻于石壁以悼之。第三阶段，我边区军民以游击战和运动战打败了敌人在华北所有机动兵力组成的报复性扫荡，那脍炙人口的“地雷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由我平山下庄民兵创造出来的。

这次战役前后历时达三个半月之久，整个华北各战区军民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毙伤及生俘日伪军共四万三千余名，拔除敌大小据点两千九百多个。从战役目标看，边区军民破坏了九百多里的铁路和三千多里的公路，摧毁了沿路的大部份桥梁、车站等设施，使整个正太路陷于全线瘫痪。事后敌华北方面军承认：“……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这次战役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而最重要的战果则在于它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向全国人民展示了我

军的战斗实力，有效地遏止了当时在国统区甚嚣尘上的投降舆论。它还就关于中国军民抗日主战场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面证据：在1941年日本军部的军事报告中，东条英机曾这样说，“……敌人（指国民党）迄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去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因此，尽管这次战役也有一些消极的后果，但从它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来估量，还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 （六）艰苦的反扫荡

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极大的恐慌。1941年，日军调来屠杀我东北抗日同胞的著名刽子手冈村宁次接任敌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妄图一举扭转其被动局面。冈村宁次素称日本军阀“三杰”之一，他上任伊始便调集起七万余人的重兵，对我军区驻地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随后又老谋深算地搞了许多阴险毒辣的新招，如什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烧光、抢光、杀光”的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以及“铁壁合围”，“分区扫荡”，“逐步蚕食”等战略战术，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以聂荣臻将军为首的边区首脑机关和普通军民一样，同样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1941年8月底，聂荣臻带着军区机关转移到阜平一带时，曾连续数次遭到敌方的飞机轰炸和重兵围堵。恰在此时，边区一些后方机关却与他们巧遇会合，一下子形成多数属非战斗人员的近万人的队伍。当时的情况是打不能打，走不好走，原地不动更非常危险，部队陷入极其困难的处境。在此关键时刻，聂荣

臻将军冷静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动向，得出敌人是根据电台讯号测出我军方位的正确判断；随即将计就计，安排军区电台单独行动，运动到一个远离大部队的地区继续发报以转移敌军的注意力。正是由于将军的正确决策，作为边区领导核心的这支近万人的队伍才得以在没遭受损失的情况下，连夜从另一个方向伺隙穿插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在那充满生死搏斗的日日夜夜里，边区军民尽管遭受了巨大的牺牲，但仍然出生入死地同敌人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并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有血有肉的故事，就发生在当时的冀中平原上；而如“狼牙山五壮士”之类可歌可泣的壮举，也正是发生在这次反扫荡的激烈战火之中。在当时那种敌我交织的混乱状态下，我军的许多部队一再被敌人冲散，但各部队的零散人员一旦会聚在一起，马上又会组成一个新的战斗集体，顽强地投入新的斗争。例如在1942年的6月9日，两百多名来自不同单位的指战员临时汇集到了深泽县的北宋庄。面对前来扫荡的两千五百多名敌人，他们齐心协力，奋勇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持续达十四个小时的激战中，我军打死打伤四百多名日伪军，最后，终于坚持到夜幕降临胜利突围。

### （七）回延安

在党中央和以聂荣臻为首的军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军民共同奋斗，逐步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和蚕食，使晋察冀边区在反扫荡的斗争中坚持下来并得以重新恢复。到1942年底，边区抗日武装力量已达五十来万，边区政府管辖有九十八个县两千余万人。随着形势的日益好转，边区于1943年1月15日召开

了边区参议会。这个会议正好在边区政府诞生五周年的大喜日子召开，它标志着日本侵略者妄图“抹掉”我抗日根据地的努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会后不久，聂荣臻将军接到党中央关于出席第七次党代会的通知，于1943年9月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并连续奋战达六个年头的晋察冀边区，回到了党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后来，由于“七大”的延期和整风运动的深入，他没能在此预定的时间内重返前线。待到他1945年9月9日重新返回晋察冀之际，伟大的抗日战争已于数周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 川军抗日名将夏仲实将军

夏培厚

## 第一回 壮志凌云 请缨杀敌

我父亲夏仲实，又名夏首勋，抗战以前曾任川军 24军第3师师长，于1933年辞职回家。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初川军组成第二梯队第三十集团军，准备开赴前线抗倭杀敌。蒋介石任命王陵基为集团军总司令兼72军军长，任命我父亲为78军代军长。王陵基素以刚愎自用，功劳归己，谗过于人，重用亲信，排斥异己而名闻全四川。我父亲在四川二刘大战中，恰巧与王陵基各为交战双方的第3师师长（王为21军第3师师长）。我父亲所率的部队曾重创过王的第3师，两人积有宿怨，因而不少亲友劝我父亲不要接受任命，恐王对他不利。但我父亲对于全国人民抗击倭寇的激昂斗志，对平型关、忻口、京沪和台儿庄等战役中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深受感动，对日本侵略者杀我同胞，掠我土地的暴行义愤填膺。他坚毅地对劝说者说：“现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作为军人，我更有双倍的责任，岂能因个人恩怨而不顾国家的危亡！”他坚定地接受了任命，并主动从家乡江津县白沙镇赴渝拜会王陵基接受其统辖，消除积怨共同团结抗日。

父亲十分清楚，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很有牺牲的可能。川军第一梯队与日寇作战中就有王铭璋、饶国华、赵渭滨等将级军官壮烈牺牲。他从重庆回来后，当即立契约将家产分给子女继承——当时我还未满9岁，也在契约上盖了手印 以示不

以家事为虑，生死置之度外，全心全意抗日救国之决心。他平素很敬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在他离别家乡江津白沙镇之前夕，在镇上举行了庄严的出师誓师大会，随行的团长陈子乡，警卫排长丘子云等人相继发言。父亲仿效岳飞（岳母刺字），在我祖母面前叩头下拜，立誓要与倭寇血战到底，不辜负家乡父老的重托。其时的情景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势！我幼小的心灵也为抗日壮士们的决心和誓言深受触动，至今记忆犹新。我为有坚毅抗日的父亲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 第二回 身先士卒 击毙倭酋

1938年中，三十集团军由湖南转到江西参加南浔会战，任务是防守瑞（昌）武（宁）公路一线。父亲所率的78军驻守武宁、修水一线。当时形势是敌我装备悬殊，三十集团军是新组成的部队，缺乏训练，各级指挥员虽有一定作战经验，却缺少配合默契。而敌人装备精良，气焰嚣张，使得中国有些军队对日寇存有畏惧之心。我父亲从1915年任连长起，历任营、团、旅、师和军长，20多年一直是前线指挥官。他深谙两军相逢勇者胜的真理，要战胜强敌，首先必须使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不畏牺牲，以自身的行为作出榜样，才能使全军的士气高扬压过敌人，这样才能够克敌制胜。而作为一军之长的军长，更应为全军作出表率。在一次部队转移的行军途中，父亲随一步兵团行进。当他们到达一座桥梁附近，突然有老乡跑来告诉他们，近处发现一队日军。听到这一消息后，父亲当即命令团长率领两个营先过桥去，他指挥另一营人埋伏在大桥两侧准备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吴团长和两位营长都很吃惊，没有想

到军长亲自断后担负掩护任务。他们竭力劝我父亲先过桥去，由他们来掩护，父亲坚决不同意，下命令让他们先走。日军也是一支行军的队伍，人数不很多，又不明情况，不敢贸然与我军交战，改道而行了。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我父亲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的精神大大地激励了全军的士气，士兵们纷纷传说：“夏军长都不怕死，我们何怕牺牲。”

父亲在江西抗战期间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友好配合。他很重视当地游击队提供的敌情情报，并对他们破坏日军交通的战术颇为赞同。他认为这样做能削弱日军的机动性，对正规军的抗日是很好的配合和支持。我记得1944年冯玉祥副委员长为抗日战士募集捐款曾到我家作客，父亲就曾对他说：“蒋先生（当时还不能直呼蒋介石之姓名）说共产党的游击队捣乱破坏抗战，这纯属无稽之谈！我就没有发现他们捣过乱。我很赞成他们破坏日军交通，破坏日军粮站的战术。他们和老百姓关系好，又熟悉地形，得到的有关敌人活动的情报比我们的要可靠些。要不是他们给我们提供消息，我们怎能击毙日寇的师团长青木中将呢？”

那是在1938年9月下旬武汉危急之际，三十集团军奉蒋介石之命在江西发动进攻，向南浔，瑞武两路挺进，以牵制长江北岸之敌，阻止日军向武汉进逼。9月底，78军以攻击前进态势，到达万家岭（德安西南）附近与敌苦战旬日，部队伤亡较大，但士气仍然很旺盛，部队倚山布防与日寇对峙。父亲和新13师师长刘若弼将军从各方面的情报（特别是游击队送来的情报）获悉日军部队将集结于德安河口，准备对我军发起一次凶猛的新的进攻。我父亲下令新13师迫击炮连布署在河口的小山岭上，待敌酋青木师团长督战向我阵地进攻时，我军炮火立刻向其猛烈轰击。青木敌酋非常的顽固，他竟然率部冲击，当场

中弹毙命。新13师乘胜出击将日军彻底击溃，敌寇遗尸遍地，狼狈而逃。我军并有较大缴获。战役结束后，陈诚大为夸奖，指出万家岭大捷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蒋介石也下令嘉奖。是役我父亲荣获一枚三级云麾勋章。川军军威大振。从37年南京、上海外围保卫战开始，到38年万家岭大捷，川军各集团军，尤其27集团军和30集团军多次重创日军。日军领教了川军的厉害，不仅不敢再轻视川军，而且惧怕起川军来了。从缴获日军的文件中发现日本陆军部的指示，要湘、鄂、赣的日军“小心提防穿草鞋、戴竹斗笠的中国军队（即川军也）”，而中国穿草鞋戴竹斗笠的军队摸清日寇的打法，从有些怯战，被动防御，而变成主动想方设法收拾小日本鬼子了。此后不久，我父亲由代军长升军长，指挥有方、作战英勇的刘若弼将军升副军长兼新13师师长。

### 第三回 深谋决断 转危为安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三十集团军经过武汉会战伤亡较大，需要休整补充。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命令72军副军长韩全朴率领伤残部队及72军军部去长沙附近休整补充，而将当时驻守武宁、柘林、箬溪地区的新13师全部，新16师的吴守权旅，统归我父亲指挥。并将新14师、新15师较完整的营连也划归我父亲统辖，向南昌附近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兼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将军的总部靠拢，同时暂归罗指挥参加南昌会战。罗卓英是陈诚军事集团的第2号人物，所谓中央军的实力派。他把父亲所率的部队摆在侧翼。在临近会战的一次高级将领作战分析会议上，中央军的将领纷纷发言，认为日寇此次战役仍将采用其惯用的战术‘中路突破，两翼包抄’，提议集中主力于中

路一线。父亲素来作战谨慎稳重，尤其考虑到此次战役与中央军协同作战，更要让他们看看川军的战斗力量。因此他多次亲赴前沿认真仔细视察地形，深入了解有关日寇的活动，比较有把握地掌握了战事的势态。在会议快结束时，他起身发言阐述了他的观点，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和作战地区的地形特点，他认为日寇不会从中路发动进攻，很可能先从两翼开始攻击，然后合击中路。我父亲是保定军校一期毕业生，和蒋介石同一期，罗卓英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的。他对我父亲似乎比对一般地方军的将领要礼貌一些，常以‘夏兄’相称，对我父亲的意见也比较重视一些。他听了我父亲发言后，略加思索说：“如果敌人从侧面首先发动进攻，请夏兄为我坚守12小时，就算立一大功。”我父亲回答说：“请总指挥放心，仲实定守阵地12小时。”结果，不出父亲所料，日军首先从侧翼78军的阵地发起进攻。父亲亲率78军顽强阻敌，固守阵地达24小时之久，超过12小时的两倍。这样，使得罗卓英能够主动从容地调遣兵力，给予日寇以较大的杀伤。战斗结束后的总结大会上，罗卓英见我父亲步入会场，马上迎上前去，拥抱我父亲并大声的说：“幸亏夏兄的预断，才使我军转危为安，取得会战（南昌会战）的胜利。”他一边说，一边把他腰上佩带的一只十分精致的美国S W型左轮手枪解下来赠送给我父亲。这是军人的最高奖赏！父亲很珍惜这只手枪，连我们兄弟都不让玩弄，只有如冯玉祥将军等贵宾来我家作客时，他才拿出来给客人或好友看。待到解放以后，父亲担任西南川东行署剿匪委员会委员时，把这只左轮枪转送给了当时江津专区剿匪部队负责人、解放军二野36师104团政治委员鲁之沫同志。

在武汉会战的南浔战役，南昌会战的武宁战役以及长沙会战的平江战役中，我父亲所率的78军多次告捷，大量杀伤日寇。

1940年，父亲光荣地获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陆、海、空三军一等奖。

#### 第四回 损家纾难 捍卫河山

抗日战争进入1939年中期，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官吏腐败，贪污成风，投机商人把粮食和布匹屯积居奇，弄得物价暴涨，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可是许多当官的，所谓的达官贵人却乘机大发国难财。我父亲虽然当上了国民党中将军长，家里的经济状况却每况愈下，母亲开始卖房卖田了。有亲友问我母亲：“别人家当官的都发了财，你家咋个搞的，卖起地和卖起房来了哟？”其原因一则是因我和我哥哥夏培健都只有十来岁，无法协助母亲理财管家；而母亲纯系老老实实的家庭妇女，大字认不了几个，在那种社会环境下，自然日感拮据。但其中却另有隐情。原来是我父亲写信给我大姐夏培温（高中学生）和二姐夏培恭（初中学生），要她们告诉母亲拿出大笔钱来作为一项专款，专门补助78军伤病士兵路过我家乡白沙镇时，发给他们盘川（四川话，即路费）和供他们留宿招待之用。（当时国民党对伤病员、牺牲的士兵家属基本上是不管不顾的）同时还要我母亲定期补助警卫排长杨月清家属的生活费用。杨的子女多，生活较困难。并且发给牺牲的轿马夫吴海山家一大笔抚恤金，资助其寡妻开一个小杂货店维持生计，并保证她的两个儿女继续上小学。父亲信中告诉我母亲，正是前方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保障了大后方的安全，是他们用血肉捍卫了78军的军威，捍卫了军长的荣誉，要象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他们。他希望我们全家理解和支持他对士兵的爱心。信中还说文天祥毁家纾难，把全部家产都用来抵抗元兵的侵略，而我们只是卖点儿田地和房屋

有何惜哉？姐姐回信说照办。自此父亲定期写信告诉姐姐78军各团、营及以上军官姓名和番号及驻地的地区名称，以供姐姐辨别伤员是否为78军者，即便不是，但凡持有荣军证书者也要给予一定的帮助。那时家乡封建意识很浓，年轻的女子不便与‘丘八’大兵交谈，所以姐姐常常要我去接待他们。我在会客室和他们闲聊，提问题询问他们，姐姐则在室内竹帘后面。一边听，一边对照父亲信中所列的军官名单，最后判定资助等级。起初，我很不愿意干。那时我才十来岁，正是贪玩的年纪，让自己放学后不玩，去干接待陌生人的事，真令人反感。经姐姐把父亲的信给我看，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深受感动。并且认识到这是一件光荣的事，与学校教师讲的关于抗日的教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日”的爱国行为是一致的，打从那时起我就不再厌烦去干接待伤员的事了。

过了一段时间，姐姐接到父亲来信，信中说他从他的好友、白沙镇上知名人士周维桢给他的信中，得知我母亲完全按照他的要求办了，他十分欣慰。我和我姐姐看到这封信心中有说不出的激动：我父亲是多么真心真意地关怀和保护他的士兵啊！原来他还嘱托他的好友监督我们是否真的在实现他的愿望！

1944年，冯玉祥副委员长到我家作客时，我父亲对国民党兵役署克扣军饷，虐待新兵的行为非常气愤。他对冯将军说：“我们前线带兵的把士兵当作儿女，可是后方各团管区、师管区（抓壮丁和训练壮丁的单位）却把壮丁当猪狗，天理难容！希望冯副委员长向蒋先生说明下面胡作非为的罪行，一定要严办那帮喝兵血的家伙。”冯副委员长听了也很气愤说：“一定要严加惩处！”